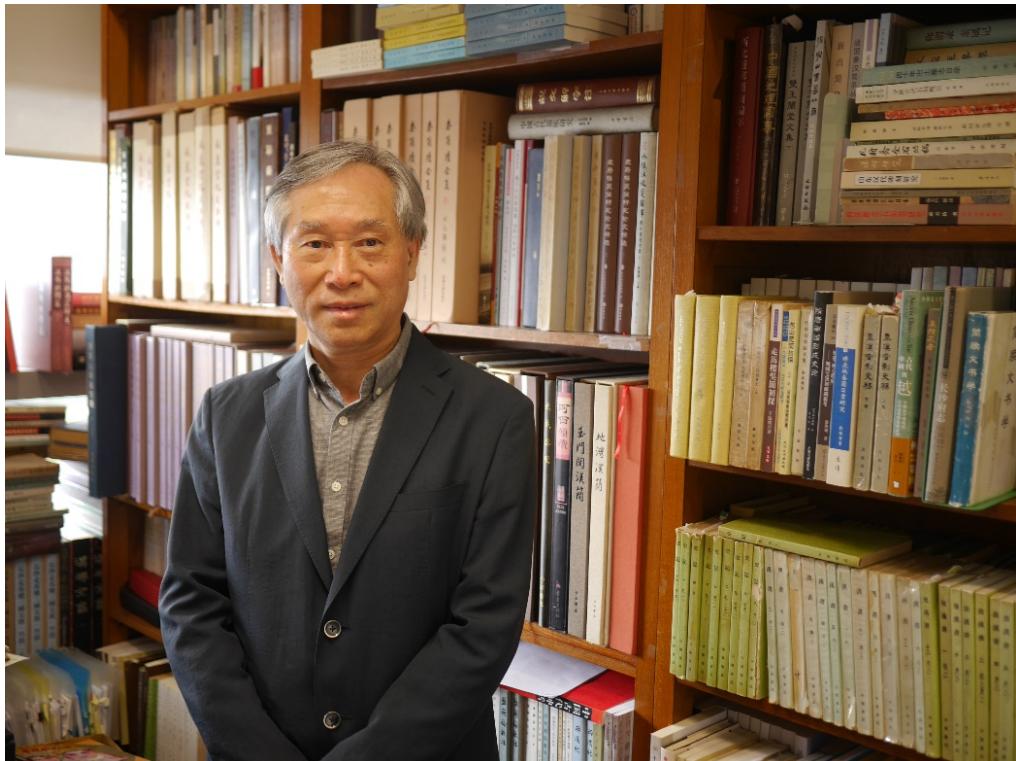


《簡牘重塑史實》——訪黎明釗教授

訪問、撰文：Ophelie C



秦漢時代距今逾二千多年，歷史的洪流滔滔，淘盡千古人物故事，但往事不一定如煙，發生過的事情總有意想不到的價值。像紀錄在古時簡牘的民間軼事，如今隨漢簡出土成為史家研究古代史的重要線索。漢代史學家黎明釗教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聞得一批批漢簡陸續出土後如獲至寶，從此在簡牘深耕數十載，並致力與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地學者組織國際學術會議探討，更趁中大歷史系開設「中國古代史專題研究」一科的教學機會，組織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研讀班，定期探討一批批新出土史料，黎教授說得雀躍：「相較文獻，漢簡是更多樣的材料，特別是社會生活方面，而且提供更多材料給我們去了解漢代。」

一樁遺孀爭產案 透視漢代商業、人口與交通往來

漢代簡牘乃是紙張未發明以前用以記載文字的典冊，內容包括漢帝國統治編戶民的紀錄、官府文書以及民間訴訟等公文。這種簡牘文書紀錄形式早已被印刷術的發明淘汰。被發現的簡牘明明被廢棄和焚燒，以為從此長埋黃土，卻因城市發展陸續出土，重現人間，成為珍貴的原始史料。僅是 1996 年湖南長沙五一廣場，就出土逾十萬枚簡牘，它們紀錄古代民間日常活動，較傳世的文獻更貼近編戶民的生活。

盜竊案、民間糾紛、家族爭產古今皆有，但秦漢時期這些看似尋常的訴訟紀錄，卻透視當時的制度、商業貿易、南北交通、人口往來以至女性地位、社會觀念及墓葬風俗，涵蓋面非常廣泛。黎教授闡釋簡牘內容的歷史價值：「正史一般沒法很仔細紀錄鄉里的活動，它只能粗略提及鄉里一些人與事，但很少提及商業活動、往來貨物、人口有多少等等資料。」漢簡內容所看到的資料，往往跟文獻內容所提供的角度迥異，「例如文獻上只提及當地盜賊猖獗，但具體發生了甚麼作奸犯科的事情？是甚麼盜賊？文獻上可能沒有說，這些資料可能微細地

紀錄某年某日發生了一件很大型的盜竊案件，雖然有些文書內容是斷簡殘篇的東西，但你可以根據出土的一整批資料研究」。

黎教授舉例說，有位商人在廣西蒼梧離世，其妻將其遺骸歸葬湖南長沙，後來返回娘家零陵居住：「為甚麼這樣做呢？是奇怪的，這是怎樣的婚姻關係呢？是不是女子地位不高？這位太太只生了一個女兒，沒有兒子。而死去的丈夫也不是長子，夫家可能分點錢給她，便要她回娘家」。黎教授細說如何從簡牘紀錄的簡單資料進一步推測和研究：「簡牘會寫到其夫有多少家產，如奴僕、侍婢情況，分產後有些奴僕跟隨妻子去零陵，在零陵十多年後，她又攜帶女兒回到長沙，為甚麼要回長沙呢？似乎是想討回一些家產。但其夫的金錢、房產和奴婢已經分掉。但之後情況，文書沒有再說，我們根據幾枚簡去推測其可能性……嘗試反映很多更多問題，譬如她由長沙搬回零陵，意味他們夫婦或許於零陵邂逅而成婚，而其夫在蒼梧做生意，又死於蒼梧，那看到其夫是從長沙經零陵到蒼梧的。由此又牽涉水路交通一個課題，商業貿易亦是另一個課題，人口往來亦可以從中看到。」



補充傳世文獻缺漏 從新出土簡牘尋突破



2008 年實地考察敦煌懸泉置遺址

「我讀大學的時候就知道國內出土很多簡牘資料，而正史和文獻材料都有無數的專家探討過，重複研究很多時是補苴罅漏。但新出的資料還未有太多研究，取得突破的機會較高。」黎教授說得坦白，看來是時代造就了他的專業，九十年代中，他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取得哲學學位後回到中大歷史系執教，偶然在學術交流中得知一批新出土簡牘的一手資訊，他憶述：「我非常記得一九九六年首次去內地參加秦漢史研究會的年會，那時我第一次聽到會上前輩公布東海尹灣的簡牘材料，我就覺得很震撼，覺得那些資料很詳細地紀錄了東海郡的長吏名籍。東海郡是在江蘇一帶，那兒屬於中原濱海地區。其中紀錄了一位汝南人，在南海郡任職」

文學卒史的，立了功勞，從南海郡調任來當曲陽尉。另一位魯國人，在桂陽任職文學卒史的，也立了功，調任來到東海任郡鄉侯家丞。漢代時期，南海、桂陽都是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推想這兩位長吏是讀書人，在南方教化黎民，有功晉陞來東海，從中可以看到有識之士在南方廣被中原文化，南北的文化也不完全是差距很大，這類問題都很值得研究。」

自此黎教授就與漢簡結下不解緣，不時實地考察各大簡牘出土的遺址，例如是敦煌懸泉置遺址、馬圈灣烽燧遺址、漢代居延都尉轄地的鄣城「紅城子」等。訪問期間，黎教授更熟悉地從書櫃翻出一本本載有相關圖片的典籍，逐一展示給筆者看：「四時月令五十條詔書就在懸泉置這裏出土，我們也曾特地去考察過！這壁書詔令就在提醒老百姓春夏秋冬有甚麼需要注意的事，例如狩獵時要敬授民時、毋殺胎、毋焚山林」。



黎教授展示《四時月令五十條詔書》圖片

着重國際學術會議交流 辦研讀班定期討論

除了實地考察簡牘出土環境，黎教授也熱衷與各地學者合辦國際學術會議交流經驗。例如在2010年，歷史系的中國歷史研究中心在黎教授主導下主辦題為「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協辦，讓歷史系的師生在中大校園跟美國、日本、韓國等學者一起探討秦漢兩代的政治權威、支配制度，以及社會、經濟、民間信仰等問題。



2010年「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國際學術會議。
(左至右)黎明釗教授、謝偉傑教授、金鵬程教授

談到研讀簡牘的緣起，黎教授希望借鑒海外讀簡經驗，他說：「我很佩服日本學者，京都大學讀簡方面真做得很好。例如一批居延漢簡出土，他們一班學者一起研讀。剛巧有一次我和一班韓國學者去日本，我們特地去聽聽他們如何讀簡。他們是每位學者分讀一批簡牘釋文，然後做報告。大家考證那些釋文有沒有錯誤？比對公布的相片，有沒有釋錯、釋漏？因為那是用漢隸書寫而成的，裏面有些古字。釋讀完後，又如何解讀整段、整篇文書呢，佳處是他們先會寫下文字註釋給大家，大家根據報告來討論。所以我回來香港就跟研究生說，不如我們也試試這樣讀。」

於是，黎教授組織研讀班，一起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讓歷史系的師生定期每周會面討論。「五一廣場出土上萬枚簡牘就非常有意思了。那批資料有很多訴訟、職官的文書資料讓我們研究。當然社會政治、民生和生活都有紀錄，而且數量很多。這對於長沙郡的地區研究，以至於長沙郡與州郡周邊的商業、人口往來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研讀班成果更先後出版成《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以及《臨湘社會的管治磐基》等書。筆者翻閱時留意到，不少論文作者均在後記談及研讀班對他們的啟發並感激黎教授指導，成果甚豐。



2008 年考察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

（左至右）陳文豪教授、楊振紅教授、黎明釗教授、馬怡教授、邢義田教授、廖伯源教授，
及考古隊工作人員和最右邊的張德芳教授

「我們就是透過漢簡了解它的制度，它的形式，書寫習慣等等各方面。透過這些資料了解漢代的歷史和文化，這些資料很多時候牽涉到社會、地區的資料。當時不同地方有不同特性，譬如長沙這批有些是軍事資料，但更很多是商業活動、人口活動和貨物盜竊、官吏受賄等各種民事訴訟材料，它與西北出土簡牘不同，西北簡牘牽涉很多軍事的東西，因為要針對匈奴，涉及如何防守邊陲地區。」黎教授又強調，研究歷史就是要從這些零碎的片段中，窺探整個時代的大局，他解釋：「一個點的研究要擴展到一個面的研究，以前嚴耕望老師、蘇慶彬老師都是這麼說的。你做了很多點的研究就可以通盤了解全面。例如了解郡府縣廷各曹的工作，就會了解到漢代行政基本架構，這是一個面的研究。透過長沙這批材料可以看到它跟周邊的關係，例如是商業關係、經濟貿易、蠻夷往來，都能看到的。我就嘗試以河流的貿易去貫穿那些經濟活動，那都是很重要的。」



酌酌一字一句 細讀詮譯還原歷史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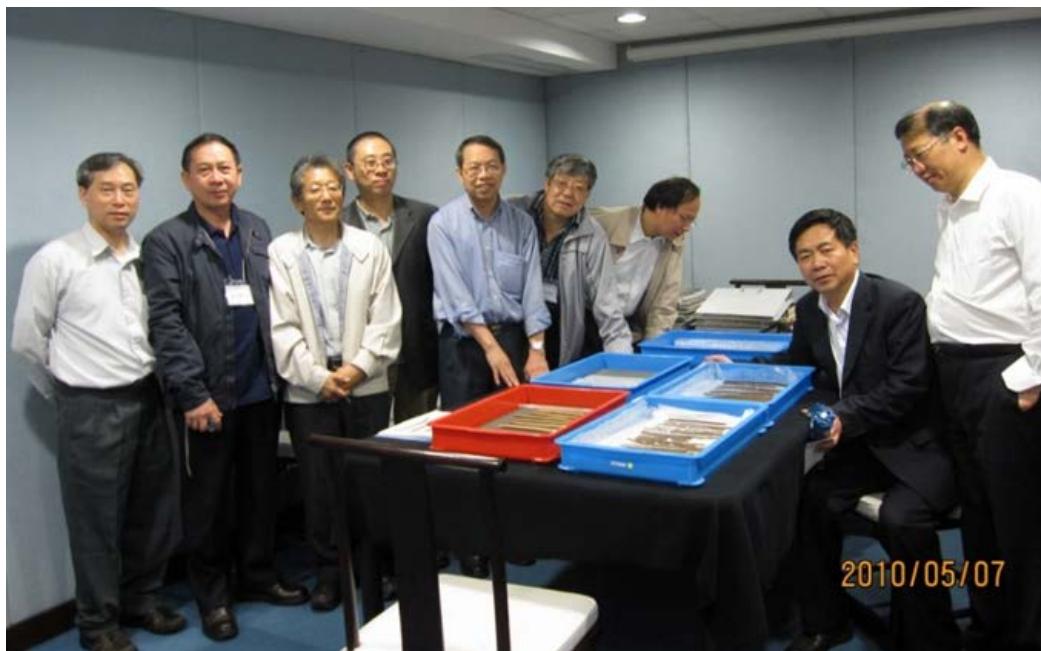
五一廣場的東漢簡牘，黎教授率先提出討論「聚族而居」問題，挑戰「里居」概念，這建基於對大局的通盤認識，此時紮實學問基礎非常重要。他強調：「（史料）需要細心的去讀，很細心的一字一句去讀。我不太贊成純粹搜尋關鍵字。雖然我們現在找資料多數都用關鍵字查，但讀歷史最重要是不同時代或不同範圍一些基礎的資料，一定要熟絡。這些基礎資料就是你的學問根基。我們的老師曾說，你要先讀了《史記》、《漢書》，即先讀了前四史才研究漢代歷史。」



2008 年實地考察敦煌懸泉置遺址。

（左至右）劉樂賢教授、侯旭東教授、敦煌市博物館楊俊先生、邢義田教授及黎明釗教授

黎教授指出，史書一字之差可能大有文章，例如「有學者研究過王莽，《漢書》、《資治通鑑》上寫王莽，各有不同寫法。就算同一本《漢書》，不同篇卷，王莽的面目都有差異，那就需要比較一下，《漢書》上怎麼寫？《資治通鑑》怎麼寫？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寫王莽時，用這條資料不用另一條資料，為甚麼有這樣的選擇呢？我們需要細心讀才能發現前後牴牾，需要細心推敲才能發現另一個史實的可信性。所以取捨資料，要細心一字一句去讀，才能看出來的」。《漢書》和《通鑑》兩者判斷是非、取捨史料，往往都有微言大義。



2010 年出席「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國際學術會議的學者參觀中大文物館藏簡牘。
(左至右) 黎明釗教授、李均明教授、藤田勝久教授、侯旭東教授、游學華博士、胡平生教授、
劉樂賢教授和孫家洲教授

回顧當歷史系系主任的工作，黎教授說最滿意是任內在西洋史方面引入了更多來自世界著名學府的老師，擴闊師生學術網絡和視野。他語重心長地說：「希望歷史系在古代、近代和西洋史這三方面都發展得更好。我們的信念是『鑒古知今』，透過歷史去了解當代發展的情況其實是很重要的。很多東西說變就變，而歷史詮譯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歷史事件發生了，你如何去解釋一件事，其實是沒有定論的。是非判斷很受當時這位史家身處的時代、學識、甚至政治社會環境所影響。同樣一位歷史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你會對他有不同評價，因為他對當代有正面或負面的作用。真實的歷史事實就擺在這兒，如何詮釋這事實很值得我們深思和思考。」